

由恶到善的人类历史进程

——康德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反思

张 传 有

如何看待由卢梭提出的社会进步与道德退步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看待人类历史发展的问題,曾经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欧洲思想界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本文介绍了康德对于这场争论的一些看法。康德运用辩证的思想方法,一方面坚定地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是一个由恶到善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又从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原则,从人类的天性与文化的冲突,从相对于科技发展而言道德滞后的理论,以及从他的“非社会的社会性”思想等方面出发解释了人类社会进步与道德退步的现象,从而较好地阐述和发展了卢梭的思想。康德对这个问题的反思至今仍给我们以极大的启迪。

从18世纪中叶起,欧洲思想界就开始对这样一个问题发生兴趣,那就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到底对人性,对人类的道德带来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或者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人类到底是走向善还是走向恶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经过一番酝酿,一场思想领域内的大辩论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公开挑起这场论战的,是法国的第戎学院,它以《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为题进行征文,明白无误地揭开了这场论战的序幕。卢梭以此为题,作出否定回答的应征论文,打响了这一论战的第一枪。对卢梭的思想支持的有,反对的也有,然而真正理解了卢梭思想的人却并不多。包括当时象伏尔泰、霍尔巴赫这样的启蒙思想家,也大多误解了卢梭的思想,从而对他大肆抨击,这是因为他们不能像卢梭那样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真正理解卢梭,并且发展了他的这一思想的,是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康德。

康德认为,随着人类的发展,对人类未来道德状况的预告是可能的。这种预告归纳起来不外有三种。第一种看法认为,人类在其道德天职上是继续朝着更坏倒退,这是一种道德恐怖主义;第二种看法认为,人类的道德是不断朝着改善前进,这是所谓幸福主义;而第三种主张被称为阿布德拉主义,这种看法认为人类的道德将永远停顿在被创造界中自己道德价值的目前阶段。对这三种看法,康德的评判是:首先,第一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退一步论,如果人类道德果真那么坏下去,坏到一定程度,也会物极必反的,其结果则是旧的世界被消灭,新的世界会到来,所以这种道德恐怖主义并不可怕。其次,那种主张幸福主义的看法也有一些问题,在康德看来,由于人的秉性中的善恶总量是不变的,所以人身中混杂有恶的善,其数量也不能超过善的一定总量之外,也就是说,无论怎样也还是有恶存在的。所以他认为这种幸福主义也靠不住,还缺少根据。再次,关于第三种看法,也就是阿布德拉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愚蠢主义,这种主义之所以主张人类道德的停滞不前,乃是认为任何道德的进步最终被道德的退步所中和,这就象古代神话中的西赛福斯一样,把山下的石头推上山去,一松手石头又滚了下来,如此往返不已,石头还是在山脚下。这简直是一种忙忙碌碌的愚蠢。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这种忙忙碌碌的愚蠢正是我们人类的本性。康德认为,如是说来,我们人类实际上是把一桩毫无希望的努力加给了我们自己,因此,在人类的天赋中,恶的原则看来似乎不是和善的原则很好地混合(溶解)在一起的,反而

是每一个都被另一个所中和,其结果就是无所作为,在这里也就叫做停顿。虽然康德对这三种看法都进行了批判,但是从总体上看他还是倾向于幸福主义的,这从康德对待门德尔松与莱辛的争论的态度上可以看出。门德尔松认为,就人类个体而言是前进的,但是人类的整体却永远在固定的限度内上下波动。他们微小地摇摆着,也就是说,他们只要前进几步,接着就马上以加倍的速度滑回到自己以前的状态。显然门德尔松是一个阿布德拉主义者。门德尔松嘲笑莱辛,因为莱辛主张:“大地上的人类整体,在时间的长河里总是前进着和完美化的。”和门德尔松相反,康德十分赞同莱辛的看法。他认为人类决不是在演出西赛福斯推石头的悲剧。他说:“既然人类在文化方面,作为其本身的自然目的而言,是在不断前进的,所以也就可以想象他们在自身存在的道德目的方面也在朝着改善前进,而且这一点尽管时而被打断,但却不会中断。”^⑩他认为,大自然的历史是由善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创作;自由的历史则是由恶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创作;由于它是由恶开始的,因而它是由恶走向善的。康德认为,说人类在道德上走向恶是不对的,但是认为人类在道德上是纯粹的善也是不对的,幸福主义就是没有看到善恶是融合在一起的。阿布德拉主义虽然看到了善恶双方,但认为它们不是融合而是中和,最后否认了人类在总体上是不断走向善的,这也是不对的。康德认为,幸福主义除了孤立地看待善恶而外,还在于它缺乏根据,因而难以为人们接受。因此,他希望为人类的不断进步找到坚实的根据。正如在他的哲学认识论中一样,康德把这种根据分为两类,一是先验的,一是经验的,他试图从人性中找到这种先天的根据。他说:“从人性里面我们是否可以摘绎出这样一些秉性来,它们会使人类物种朝着改善前进,并使过去和目前时代的恶都会消失在未来的善中呢?”^⑪他认为是可以做到的,他从人性中找到了这种秉性,即一种趋向改善的秉赋和能量。他认为,这种趋向改善的秉赋和能量是人类道德进步的动力。显然,这实际上就是卢梭所说的人类完善自身的能力。康德认为,除了这种秉赋和能量而外,人还有一种影响后代使他们永远变得更好的义务,这种义务的合法遗传,带来的是人类世代的不断进步。除了这种人性的先验根据外,康德认为,还可以有许多经验的根据证明人类整个说来在我们时代确实比起以往的一切时代来,在道德上做出了非常可观的改善。这样的经验事件无须到别处去找。当代的一桩事件就明白地表明了人类的这种道德化倾向。这就是发生在当时的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表明了人类全体的一种特性以及同时(由于无私性)他们至少在秉赋上的一种道德性;那使人不仅可以希望朝着改善前进,而且就他们的能量目前已够充分而言,其本身已经就是一种朝着改善前进了。因此,无论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证明,都可以得出一个在理论上最严谨的可以成立的命题,那就是:人类一直是在朝着改善前进且继续向前。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康德是主张人类道德不断进步的。但是他也不否认其中有退步的方面。他认为退步不属于整个的族类,而是个别的人。正是站在这种立场上,他一方面原则上赞同卢梭的看法,另一方面则认为,卢梭的表达常常给人以误解。康德认为自己的任务就在于进一步阐述这种思想,消除人们的误解。为此,康德首先提出,之所以人们对人类道德的发展有诸多看法,这里有一个观察事物的立足点的问题,一个方法问题。他说:正如从地球上,行星是时而后退,时而静止,时而前进的,但是从太阳这个立足点上看,它们却是依照哥白尼的假说而在它们合乎规律的轨道上前进一样,对人类的进步与退步,也有一个观察事物的立足点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是从个别的人,而是从人类整体出发去观察,我们就会看到这一历程对于整个物种来说乃是一场由坏到好的进步;可是如果我们从人类的个体出发去看,那就并非同样如此了。因为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出现了过去不存在的戒律和禁令,个人的自由实际上受到了限制,同时也就出现了违法犯禁之事,因而罪行这个东西也就随着理性的开化,文明的进步而来到了人间,因此,从个人的角度看,这里又包含着一种退步。康德认为,作为人类的一员,每个人应承担自己本身的过错,同时作为整个物种的一员,每个人也应该为人类的进步而感到惊叹和加以赞美。他认为,正是他的这种把人类整体的进步与个体的退步区分开来的做法,使得卢梭命题中的矛盾在它们对理性的关系上得到了统一。

其次,康德还想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文明发展和道德退步的问题。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文化与人类天性之间所存在着的不可避免的冲突所致。这种冲突,既使人类的自然秉性受到不断前进着的文化的摧残,反过来它也摧残着文化,从而表现出文化的进步与人性的堕落。对此,他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说的是有关人的成熟期的问题。康德认为,按照人的自然秉赋,人的自然成熟期是在16、17岁这个时候。如果在自然状态中,这时候的人就成熟了,就可以养家糊口,组建自己的家庭了。然而随着文化的发展,处在公民社会的人的成熟期推迟了将近10年,不是16、17岁,而是26、27岁了。“然而大自然却并不因此而随着社会前进的步

伐而同时改变人们成熟的时限,反而顽强地遵守她所规定的维持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那些定律,由此便产生了一场道德的自然目的与物种的自然目的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决裂。”^⑨当人们不能随着文化进步而不断改变自己的自然秉赋,限制自己的自然本能时,当然也就会随着文明的发展而出现一些罪行或不幸的后果了。这就表现出文化与人类天性之间的相互摧残。康德举的第二个例子是说,文化的发展要求人们长寿,可是正当最幸运的头脑处在技术和经验的最佳状态而有可能获得最伟大的发现的边缘时,人的老境却到了,人变得迟钝而保守了,而且是死亡也将至了,这样人们又不得不从头做起。人类完成其全部天职的历程,文化进步的历程,看来也就是不停地中断并且始终处于再次沦于古老的野蛮状态的危险之中了。康德发出了人生太短的感叹。这就是人的自然秉性对文化的摧残,它影响着、阻碍着人类文化的发展。康德提出的第三个例子,也就是卢梭所说的平等与不平等的问题。即随着文化的发展,最终带来人类在普遍人权方面的不平等,人类文化的发展使得人类进步了,但是它又使得作为人的自然秉性的自由受到限制,使人类固有的平等变成了不平等。这当然也是文化与人类天性冲突的典型表现。康德认为,面对这种冲突,我们的任务是要想办法解决它,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给自己提出“文化必须怎样地前进,才可以使人类的秉赋得到发展,而使它不再与作为一个自然物种的人类相冲突”的问题。他认为卢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卢梭在实际上已经在他的《爱弥尔》,以及他的《社会契约论》中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了。康德认为,解决这一冲突的唯一办法,就是必须使文化逐步变成人的天性,只有文化变成了人的天性,文化和人的天性之间的冲突才有可能解决。文化与人的天性的相互摧残,也只有到完美的艺术成为天性时才会停止。康德的这种思想给我们以启迪。实际上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也有一个文化与人的天性的冲突的问题。要想贯彻好人口政策,就必须通过教化,使文化变成人们的天性,使人们摆脱无知与愚蠢,跟上文明发展的步伐,从人的天性出发去自觉遵守和贯彻我国的人口政策。这一点恐怕是行政命令和违纪处罚所不能代替的。康德在文化与天性的冲突问题上的形而上学在于,他相信这种冲突有一天会停止。其实,这种冲突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终止的。人类就是在这种冲突与冲突的解决之中前进的。

第三、为了说明文明的发展与道德的堕落有可能并存,康德提出了道德滞后论的思想。他认为,文明(特别是科技)的发展与道德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后者总是落后于前者。他说: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才能、技巧和趣味(及其后果:逸乐)的培育,自然而然地要跑在道德发展的前面,而这种状况对于道德以及同样对于物质福利恰好是负担最大而又最为危险的事。他认为,人类的道德秉赋总是姗姗来迟。这样,就会使由于才能和技巧的发展所带来的新的道德问题缺乏新的道德尺度去加以衡量与规范,当人们用以往的、旧的道德尺度去衡量时,就有可能惊呼技艺的发展带来了道德的沦丧了。康德在当时能够提出这种看法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证明了他的看法的正确性。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迅猛地推进着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另一方面也带来一些新的道德问题,对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新的立法,而且需要新的道德法则、规范乃至观念。比如人工智能的发展所带来的机器人的行为法则的问题;再比如人工授精试管婴儿所带来的新的道德观的问题。这些都是现代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

第四、在康德那里,真正解决卢梭所提出的问题,是他把社会进步(善)与道德退步(恶)统一起来的“非社会的社会性”的思想。在这里,不是一方面是进步,一方面是退步,而是既是进步又是退步,既是善又是恶,恶是善的动力,善是通过恶来达到的。所谓“非社会的社会性”,就是说在人性之中既有社会性的一面,又有非社会性的一面。人具有社会性,也就是说人类有一种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正是这种倾向使人进入社会,使人感觉到自己不止是人而已,也就是说感觉到他的自然秉赋有可能在社会中得到发展。他需要人,需要自己与他人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人的非社会性,也就是人有某种强大的,要求自己单独化(孤单化)的倾向。这是因为人有某种想一味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摆布一切的倾向。这种倾向经常威胁着要分裂社会。它是贯穿于社会始终的阻力,然而它又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因为正是这种阻力才唤起人类的全部能力,推动着他去克服自己的懒惰倾向。并且由于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的驱使而要在他的同胞们——他既不能很好地容忍他们,又不能脱离他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于是就出现了由野蛮进入文化的真正的第一步,而文化本来就是人类的社会价值之所在。康德认为,这种非社会性并不可爱,可是没有它又不行,因为没有它,人类的全部才智就会在一种美满和睦、安逸与互亲互爱的阿迦底亚式的牧歌生活中永远被埋在它们的胚胎里。因此,在康德看来,一切为人道增光的文化和艺术,最美好的社会秩序,都是这种非社会性的结果。它由于自己本身的迫使而在约束自己,并且通过强制的艺术而使大自然的萌芽得以充分发展。这种非社会性是一种自私的倾向,它除了表现为

上述的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而外,它还外在地表现为个人与个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互相敌视的现象,乃至战争的行动。康德认为,它就是大自然用来达到我们上述的自然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他把这种非社会性称之为对抗性。他说:“大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秉赋得以发展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但仅以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为限”^①。他认为,大自然正是利用这类被创造物的不合群性作为手段,使他们从不可避免的对抗中求得一种平静与安全的状态。在一个民族内部,通过竞争与对抗而达到自由与秩序;达到各成员间的自由共存共处,达到建立一个具有最精确规定和保证的自由,一个具有这种自由的共和制国家。在民族与民族之间,通过民族间的敌视、对抗和战争,建立一种脱离了野蛮人的无法律状态的各民族的联盟,一种通过竞争达到平衡的、有保障的和平。这就是康德向往的“永久和平”。通过非社会性达到永久和平,这就是康德设想的由恶到善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显然康德在这里比较好地解决了人类进步(善)和道德退步(恶)之间的关系,把它们的对立变成了合二而一的东西,用他的话说就是融合而不是中和在一起。康德在此已经明确意识到竞争与对抗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实际上在黑格尔之先提出了“恶”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的思想。同时,也为卢梭提出的问题寻找到一个较好的答案。如果我们用这种观点去看待现实社会中出现的恶,我们就不会成为某种道德悲观论者,我们也会看到,社会主义的道德正是在对这些恶的战胜中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最后,康德对那种由于对卢梭思想的误解或有意歪曲所引起的道德悲观论者提出了批评。康德认为,那种美化人类原始状态,把它说成是人类的黄金时代的说法是错误的,由此而鼓吹回到原始状态中去就更不应该。他说,正是由于人类不满足原始状态,他们才不使自己停留在这种状态。因此他们决不会再返回到这种状态之中去。康德针对那些认为人类道德不断败坏的悲观主义的说法指出:其实,那种关于人类的腐化正在不断增加的叫喊,在一定程度上正好反映了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反映了人类的进步。因为有许多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事,在以往并不被人们视为不道德,只是因为人类自身的道德水准提高了,人们才认为它是不道德的。康德说,当人们站到更高一级的道德水平上时,他们就向前看得更远;越是随着我们在整个我们已知的世界历程中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他们对我们实然的样子判断,与我们所应当是那种样子相形之下,因而亦即我们的自责,也就越发严厉。仔细想想,我觉得康德的说法也很有道理。比如说,我们以前对破坏环境不在乎,现在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大加谴责,坚决反对,抱怨人们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这正好证明人类环境意识的提高,正好证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道德水准的上升。由此,我们决不可以得出道德悲观主义的结论来。

综观康德对人类文明及道德发展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康德是坚信人类是在不断向好的方面发展的;而且他在阐释文明发展与道德退步这个问题上的说法是充满辩证思维的。当然,当康德把人类进步与个人退步绝对分割开来,当他把人类进步完全归因于对抗性这个恶时,他又是形而上学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因为“恶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说法虽然有片面真理性,但是它毕竟是从人性,而不是从客观的物质方面去说明历史的。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是人们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是由这种需要所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尽管康德的历史观中不可避免地有这样一些缺陷,我认为重温他对文明进步和道德退步的一些分析和说明,对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在改革大潮中,在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良现象还是有一定的启迪作用的。我们可以想想,我们是否像康德所批评的那样把进步与退步、把善和恶绝对地分割开了;我们是否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时,跟不上形势发展,用旧的道德观念去评判新的社会现象;我们是否像康德那样在批评谴责非道德现象时看到人类在道德上的进步,看到反映于其中的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在我们身上是否有道德恐怖主义(或悲观主义)和阿布德拉主义的影响和表现。我相信,在我们像康德那样对现实中的道德问题进行一番辩证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分析以后,我们一定会坚定这样一个信念,那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突飞猛进,我国人民的道德水准不会越来越糟,而会越来越高,终将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程度。尽管这种道德水准的提高有可能像康德的道德滞后论所说的,相比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到来得晚一些。

注 释:

①②③④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04、202、69、6页。

(本文责任编辑 彭昌林)